臺灣文學研究集刊　第三期
2007年5月　　頁51~84
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臺灣文學的邊緣戰鬥：跨域左翼文學運動中的旅日作家

柳　書　琴*

摘　要

30 年代日本左翼文化界有相當規模的跨域交流。以日本左翼劇壇、左翼文壇為中心的跨域交流，參與者包含了日、中、臺、朝、滿，甚至國際左翼團體在內的各國旅日人士。臺灣文化界與日本左翼文化界及中國旅日戲劇文學人士的交流，正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在臺灣方面落實這些交流的，是一批企圖借重日本左翼文化陣營，廣結國際反帝勢力，追求殖民地解放的文藝青年。

凝聚於臺灣藝術研究會的這批青年，於 1934 年左右因為經費、人力及成員意識形態問題，陷於疲態。不過他們卻因為島內臺灣文藝聯盟的成立、與島內文藝運動合流，而一躍成為臺灣文藝聯盟聯結海外文藝運動的先鋒。以吳坤煌、張文環等人為中心，臺灣藝術研究會於 1935 年蛻變為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至 1936 年秋之間，他們與東京若干中、日反帝文化團體進行多邊的合作與交流。雖然他們的活動有限，但是他們在此一交流過程中流露的視野與企圖，卻彌足珍貴。對這批旅日青年來說，臺灣是他們的終極關懷，在國際反帝運動中他們是獨立主體，與其他民族平等合作。但是另一方面，由於依附於以中、日民族為中心的國際陣線，他們也難免成為邊緣的客體。這種既中心又邊緣的文學運動與文化抗爭型態，以及當時臺灣作家與中、日，甚至朝、滿等文學者的往來與接觸，在臺灣文學史上堪稱特殊的一頁。

臺灣文學史上這精采的一頁向來未受注意和討論。本文的目的便在以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靈魂人物吳坤煌、張文環為中心，對此一珍貴的跨域活動進行初步的勾勒。

關鍵字：文聯東京支部　左聯東京支盟《臺灣文藝》《福爾摩沙》
吳坤煌　張文環　王白淵　賴明弘　雷石榆

96.4.15 收稿，96.5.18 通過刊登。

* 作者為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助理教授；投稿期間，感謝兩位匿名評審提供珍貴修改意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言

30 年代臺灣反殖運動的主力，從激越的政治社會運動逐漸遁入穩健的文學文化抗爭中。在反殖型態的轉換過程中，政治運動者和文學運動者的重疊性不高。這或許是因爲 20 年代後期社會主義運動高漲的年代，文藝運動的政治潛力尚未被充分重視，文學議題常附屬在政治議題之下顯得模糊。而進入 30 年代以後，從事左翼政治運動者經歷數次大檢舉，或流亡入獄、或脫離陣線、或停止運動，此前政治熱高漲時期潛心文藝議題者也有限，故而從政治社會運動轉進文藝領域進行抗爭者並不多見。因此當社運旗手受到政治制壓零落之後，接替他們活躍的是另一批文藝新秀。[1]

反殖型態的轉換過程以血輪更替的換手方式展開，因此 1933 年日共佐野學及鍋山貞親等人掀起的轉向風潮[2]，對往往集文藝者和共產黨員（或社會主義運動者）於一身的日本文藝界所引發的衝擊，在臺灣文學界似乎並未同樣廣闊深刻地發生。日本作家在獄中經歷長時間的反覆刑求、訊問及「思想善導」之後，簽署「轉向聲明」的體驗，在臺灣作家身上也不多見。「轉向」題材似乎只在王詩琅〈沒落〉、〈十字街頭〉、張文環〈父親的要求〉（〈父の要求〉）……等少數參與過左翼運動的作家筆下閃現。換言之，除了曾躬逢左翼政治運動尾巴的少數作家之外，對 30 年代大多數的殖民地文藝新秀而言，「轉向」與其說是一種試煉抉擇的風暴，不如說是一種不容多作掙扎的既成現實。比起探究「轉向」問題或刻劃迎拒掙扎的心路歷程，他們更關心如何以不同取向的文藝運動繼承反殖運動，實現文化抗爭理想，同時繼續維持和擴張既有文壇的發展。[3]在當時日益傾頹的日本左翼文化運動迫需聯合東亞左翼文化人士爭取最後的生存的背景下，旅居東京的臺灣青年由於語文之便以及殖民地

---

[1] 以在東京的海外反殖運動轉換經過而言，20 年代後期林兌、蘇新、陳來旺、林添進、何火炎、吳新榮……等臺共或左翼運動者當時並不注重文化文學議題，而 30 年代文化文學運動的主要旗手張文環、吳坤煌等人雖曾稍涉社會主義運動，但是當時整 個運動已進入尾聲，故參與有限。

[2] 1933 年 6 月，被日本政府判處無期徒刑的日本共產黨中央領導幹部佐野學和鍋山貞親，在檢察官誘導下，發表《叛黨聲明書》，承認皇室是「民族統一的核心」，並譴 責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天皇口號。《叛黨聲明書》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朝鮮和中國表示 支持，並稱之為「這是歷史的進步」。此聲明發表後，在佐野和鍋山的影響和帶動 下，許多被捕的普羅作家，也紛紛發表「轉向」聲明，一時出現了所謂「轉向」的時 代。參見，劉柏青編〈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簡史（1921-1934）〉（長春，時代文藝出 版社，1985 年 10 月，1 版 1 刷）。

[3] 當時島內外文藝雜誌均熱衷於臺灣文學的出路、語文表達工具、文學內容與形式等議題，便是一特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化人的身份，在日本左翼文化界與留學／流亡日本的中國左翼青年文化人之間，扮演了某些翻譯、介紹與協調的角色。這個過程中，文藝創作與活動方面累積出來的人脈、視野、指導理念和各種資源，便使他們在思索臺灣島內文壇出路、勾勒殖民地文化抗爭圖景時，更爲開闊有力。

1934 年底到 1936 年秋之間，以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簡稱文聯東京支部）爲舞臺，旅京文藝青年與日、中、臺文學團體或左翼作家結合，開始了臺灣文學史上罕見的跨域活動。儘管這些互動並不廣闊頻繁，沒有共同組織或固定活動，嚴格來說不過是旅日青年以私人人際構聯的一個不甚穩定的交流網絡。但是在這樣的文學網絡中，卻閃爍了旅日文學菁英跨域文學運動的思維。在島內左翼政治社會運動的赤焰近乎熄滅的時刻，星星之火猶不放棄，聯結其它國際左翼邊緣勢力，他們意圖另尋文化抗爭的資源。透過 1930 年代前半期日本左翼文化界勉強存續的日、中、朝、臺、滿左翼文藝及戲劇運動之交流網絡作爲平臺，軍國主義抬頭下發展日益困難的臺灣文學界獲得了海外結盟的機會。藉此臺灣旅日作家不僅與日本左翼文化運動人士進行交流，也進一步與中國左翼文化人，乃至朝鮮、僞滿洲國作家有所接觸。除了文藝活動上的交流，稿件的交互刊載，還包含郭沫若等中國旅日作家的理念指導。在這一頁歷史中，令人炫目的不只是這些交流本身，亦是隱藏在這些互動背後，堅守理想、勉力爲之的價值視野和行動模式，流露的野心和遠見。

臺灣文學史上這罕見的東亞多國左翼文藝人士的海外結盟，除了北岡正子在以中國左翼詩人雷石榆爲中心的研究中稍有涉及之外，向來乏人研究。[4]筆者將以臺日兩地調查所得的零碎文獻爲基礎，以吳坤煌、張文環等活躍份子爲觀察中心進行討論。目的在闡述文聯東京支部、左聯東京支盟、日本左翼詩壇劇壇、及臺灣島內文壇之間，如何逐次形成一個帶有左翼性質的跨域文學交流網絡？臺灣作家在這個交流網絡中的活動情形，以及此一現象在臺灣文學史上顯示的意義如何？

[4] 1999 年筆者在日本進行相關資料的調查時承蒙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多次指導與幫助，謹此致謝。北岡正子相關論文有：〈『日文研究』という雑誌（下）：左聯東京支部文藝運動の暗喻〉，《中國——社會と文化》第 5 號，東大中國學會，1990 年 6 月。〈雷石榆『沙漠の歌』：中國詩人日本語詩集〉，《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49 集，日本中國學會，1997 年 10 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盟

1934年在吳坤煌、張文環的領導下，陷於疲態的臺灣藝術研究會（1932年成立）因爲與臺灣文藝聯盟合流重現活力，本土文壇也因旅京菁英的合流更能發揮文化聯合陣線的效力。臺灣藝術研究會與臺灣文藝聯盟合流後，改稱文聯東京支部。支部的志向並不止於支持島內文藝運動而已，他們更大的野心在於以旅京之便廣結資源，爲島內已無希望的若干運動找到出口。除了向旅日同鄉或對臺灣持同情態度的日本人士進行募款及宣揚之外，支部也積極與日本左翼同人雜誌、旅日中國留學生、旅日朝鮮人進行串聯或合作。這個部份投入最深、最活躍的，是吳坤煌和張文環兩位。

1935年5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盟[5]（簡稱左聯東京支盟）機關誌《雜文》[6]創刊號出版。該號目錄上明載〈臺灣文壇之創作問題〉一篇，作者爲張文環。不過翻閱該誌各期均未見此篇，也沒有其他署名張文環的文稿。[7]換言之，這篇評論應是有目無文的。

張文環爲什麼投稿《雜文》，又爲什麼與左聯東京支盟發生關聯呢？遍查東京支盟其他刊物之後，吳坤煌的名字意外映入眼簾；支盟詩刊《詩歌》第二號，以顯著標題刊載吳坤煌的〈現在的臺灣詩壇〉[8]一文。依誌面顯示張、吳是當時左聯東京支盟刊物中僅有的兩位臺灣作家。吳坤煌參與了東京支盟較多活動，與支盟往來最密切者非他莫屬，因此他爲我們探查當年的跨域交流留下了一些線索。本小節首先從中、日團體中與臺灣作家互動甚多的「左聯東京支盟」談起。

「左聯東京支盟」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呢？1930年3月中國左聯於上海成

---

[5] 東京支盟，也有人稱為東京支部、東京左聯，依林煥平表示當時一直以「東京支盟」自稱。另外東京支盟在東京時也簡稱「左聯」，與「劇聯」、「學聯」、「社聯」等組織相應。

[6] 根據林煥平回憶，《雜文》第 2 期（1935 年 6 月）出版後便受到東京警視廳注意，第 3 期後被禁。在當時旅日的郭沫若建議下，更名為《質文》。林煥平〈從上海到東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雜憶〉，收錄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左聯回憶錄（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 5 月，1 版）。

[7] 該文標題刊於《雜文》創刊號目錄，1935 年 5 月。張文環與左聯東京支盟人士的往來問題，承蒙陳萬益教授教示，同時感謝愛知大學黃英哲先生，惠賜吳坤煌、雷石榆、張文環等人與支盟活動相關之珍貴文獻。

[8] 吳坤煌〈現在的臺灣詩壇（上、下）〉，《詩歌》（詩歌社）1 卷 2 號，1935 年 8 月 3 日；1 卷 4 號，1935 年 10 月 10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立，1931年春至5月前後，以葉以華、任鈞爲主幹，加上謝冰瑩、孟式鈞、樓適夷、胡風、聶紺弩等中國青年學生不滿十人，於上海左聯支持下成立左聯東京支盟。支盟份子與「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納爾普」）、「日本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會」、「中國問題研究會」……等左翼團體，或秋田雨雀、小林多喜二、德永直、中野重治、村山知義、森山啓、上野壯夫、窪川稻子……等左翼作家、演劇人都有接觸。不過此支盟成立時間只有幾個月，1931年9月便因成員陸續返國而陷於停頓，學界一般稱之爲「前期左聯東京支盟」。[9]

1933年停滯的支盟有了轉機。該年9月林煥平[10]在左聯組織部長兼黨團書記周揚指示下，背負重建使命抵達東京。他與前支盟未返國成員孟式鈞聯繫之外，還特別拜見與前期支盟及郭沫若往來密切的江口渙（1887-1975，小說家、評論家）[11]，請教組織及發展問題。林煥平回憶拜訪情形如下：

[9] 譬如，葉以群（本名葉元燦，筆名華蒂，1911 年生），1929 年於法政大學經濟學部，但是主要興趣為閱讀、翻譯日本左翼文藝理論及作品。當時他經日本進步同學的介紹，參加「日本無產階級科學研究會」、「中國問題座談會」，並與「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取得連絡，和秋田雨雀、小林多喜二、德永直、中野重治、村山知義、森山啟、上野壯夫、窪川稻子等作家、詩人、演劇人接觸，並在上海《文藝新聞》、《文學導報》發表其訪問記、小品。

[10] 林煥平（1911-?），廣東臺山縣人。1930年6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1年9月入暨南大學就讀，因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為學生領袖之一，後遭學校無理開除。1933年9月赴日留學，進入鐵道專科學校，課餘從事文藝理論及哲學研究。同時任左聯東京支盟書記，及機關誌《東流》主編，並兼《雜文》編委。1934至1936年間，在上海《申報・自由談》、《太白》等進步報刊上發表多篇文論，並於上海新潮出版社出版譯作《蘇聯教育大觀》。1937年5月因「反日作家」罪名被日本政府驅逐回國。1938至1942年，任香港廣東國民大學教授，香國中國青年新聞工作者協會常務理事。後轉赴內地，先後任教於廣西大學、桂林師範學院、西南商專等。1947年再度赴港，任《文匯報》社論委員，並與人創辦南方學院，擔任院長，亦為中國文協香港分會理事。其後歷任廣西大學、廣西師範學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等。著有詩集新的太陽》，文藝論集《抗戰文藝評論集》等。參見，姚辛編著《左聯詞典》，前揭書，頁156-157；謝榮滾（主編）《陳君葆日記（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年4月），頁890。

[11] 江口渙，1920年參加日本社會主義同盟，1927年組織無產階級文藝同盟，1929年加入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1933年以後幾度入獄。1933年發表短篇小說《人生入口處》，反對轉向文藝。二次大戰期間隱居山林，從事兒童文學與古典文學研究。參見，呂元明主編《日本文學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年11月），頁3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江口先談當時日本的形勢：資本主義經濟大恐慌尚未復甦，日本軍閥對外加緊推行侵略中國的政策，妄圖在侵略戰爭中尋求解脫恐慌的出路。對內加強法西斯統治。對日共和左翼文化界鎮壓很殘酷。1928 年“三・一五”大逮捕以後，日共就瀕于潰滅的狀態。左翼文化團體很難活動，他們改變了方式，以辦同人雜誌的形式，一個雜誌團結一批人，組織形式比較鬆散，卻又是有核心，這樣開展活動，應付日本法西斯的壓迫。當時有《文化集團》、《日本詩歌》、《唯物論研究》等雜誌。我也把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情況向他介紹了。並表示今後我們在東京的活動，希望得到日本左翼作家的關照。江口高興地連聲說好。[12]

當時日本情勢極不利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運動發展，因此江口渙建議林煥平等人倣效左翼文化團體新策略，以散立的同人雜誌形態發展組織與活動。

1933年12月左聯東京支盟重新被建立了起來，江口的教示對組織和活動產生了決定性影響。爲落實以同人雜誌廣結同志之目的，同時避免一旦出事便全體覆滅的危險，支盟從1934年8月到1936年11月期間先後發行了《東流》、《詩歌》、《雜文》（後改名《質文》）[13]等三個同人刊物。各誌發行時間略有重疊，刊物同人不盡相同，有部份重覆。東京支盟活動據點設於神田區青年會，此亦爲臺灣人海外運動重地。除了組織上採散立政策，活動也以小組聚會方式展開。蔡北華回憶當時的活動情形如下：

> 在日本法西斯統治下，左聯只能採取以專業愛好為基礎，三三兩兩組成小組，而公開活動通過藝術界座談會，大約一周或兩周舉行一次，地點多在神田區和新宿區的咖啡室，每人付五角左右，可以在餐室座談三、四個小時。每次座談都有中心題目，如《社會主義和現實主義》等等。（中略）。來自祖國各地的同志也都扼要報告了各自從事左翼文化活動的情況。通過這種方式，無形中把大家團結和組織起來了。[14]

---

[12] 林煥平〈從上海到東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雜憶〉，頁683。

[13] 三刊發行時間如下：《東流》（1934.8-1936.7）、《詩歌》（1935年5-10月左右）、《雜文》（1-3號，第4號到2卷2號更名為《質文》）（1935.5.15-1936.11.10）。

[14] 蔡北華〈回憶東京左聯活動〉，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左聯回憶錄（下）》，前揭書，頁698-6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藝術界座談會」，包括了戲劇座談會、詩歌座談、詩歌朗誦、美術座談會、音樂座談會等。其中詩歌社舉辦的詩歌座談會兩週一次，討論詩歌理論和創作，及同人作品互評。除了這些活動之外，也舉辦習作展覽會或戲劇演出。當時支盟成員大概有四、五十人，經常參加藝術座談會者約有七、八十人。從活動的頻率、類型之多元及參與人數來看，支盟活動相當活絡。

出身北平中國大學的林林爲支盟活躍份子，曾同時參與《詩歌》和《雜文》兩誌。[15]他提及支盟活動時指出支盟並無明確的活動方針。他說：「那時"左聯"東京分盟的盟員，都是二十歲出頭的年青人，文學修養底子薄，外文水平也不高，憑一股要進步，要搞革命文學的熱情，同時崇敬魯迅、郭沫若兩位前輩，並得他們的支持和鼓勵，就幹了許多爲中國和日本當局所不容的文學活動。」[16]林林並舉出他們傲人的活動有：翻譯馬克思、恩格思文藝論文；討論文學遺產的接受問題；介紹羅曼羅蘭、紀德及蘇聯革命詩人馬耶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介紹世界文學及日本文學動態……等。還有便是與臺灣文藝青年交流與合作，他說：

> 和與祖國分離的臺灣文藝青年合作，我們的刊物登了張文環的〈臺灣創作問題〉（《雜文》第一期），吳昆煌（按，吳坤煌之誤）的〈現在的臺灣詩壇〉（《詩歌》第四期），臺灣朋友又選擇

[15] 林林（1910-?），原名林仰山，福建詔安縣人。原於中國學習政治經濟，1933年入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經濟系，後因對資產階級經濟學不感興趣，轉而學文學。1934年夏，由詩人蒲風和陳辛人介紹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分盟。1935年與丘東平同任東京左聯幹事會幹事。在東京左聯領導的《雜文》（後改名《質文》）、《東流》、《詩歌》雜誌及上海的《光明》、《文學叢報》上發表詩歌和詩論，描寫中國工農紅軍的詩〈鹽〉曾被譯成日文，在日本《詩精神》雜誌刊出。亦曾任《留東新聞》副刊編輯。1936年6月，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擁護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年7月，在橫濱參加郭沫若主持的國防文學座談會，隨後為擺脫日本便衣警察干擾而回上海。同年11月，《質文》2卷2號發表林林的〈詩的國防論〉，認為詩人必須負起「社會的使命」，詩歌應該「有變革現實和推進生活的藝術力量」，號召學習拜倫、海涅，創作「國防詩」。參見，姚辛編著《左聯詞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年12月），頁155-156。此外有關林林，林煥平曾回憶道：他「原是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參加北平"左聯"的活動，受環境所迫，到日本去了。」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左聯回憶錄（下）》，前揭書，頁685。

[16] 林林〈"左聯"東京支盟及其三個刊物〉，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左聯回憶錄（下）》，前揭書，頁712-7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較好的作品譯為日文，送到日本文學雜誌刊登。對當時所謂"滿洲國"的留學生也不歧視，是採團結的姿態的。[17]

林煥平重建支盟以後，支盟先後透過他及林爲梁與周揚單線聯繫，接受中國共產黨與國內左聯（也在共黨領導下活動）的長期指導。此外支盟的三雜誌都曾受到魯迅和郭沫若，在經濟上和稿件上的諸多支持。魯迅曾從國內多次寄稿聲援，當時客居日本的郭沫若對支盟的協助尤多，經常投稿、接受支盟員拜訪，指導或出席支盟相關活動。東京支盟書記林煥平，曾說明當時他們與「郭老」的聯繫方式：

> 郭沫若住在東京附近的千葉縣，經常在日本憲警的監視之下。郭老把自己在日本的處境喻為在"監獄"之中。怕影響郭老的安全，我們不隨便去找他。我們也是請魏猛克去同他聯繫。正如猛克自己說的，"我自由散漫慣了，不易引起注意。"當初我們有顧慮，總是把郭老的安全放在首位去考慮。郭老自己有把握，倒是熱情地支持我們。[18]

此外依《郭沫若年譜》所見，1935年5月支盟及「雜文社」成員魏猛克、陳辛人、孟式鈞等人曾赴郭府商談，結果郭沫若應允參加左聯東京支盟，並答應爲《雜文》撰稿。因此，郭沫若也是支盟重要一員。

《東流》、《雜文》、《質文》上不時可見郭氏稿件，支盟成員陳子鵠、任白戈、林林、蒲風、張春山……等人也常拜訪或在其他場合接觸郭氏。支盟成員聶耳溺斃時郭氏悲慟撰寫〈悼聶耳〉一詩；1935年《東流》刊載他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說「中日文化之交涉」之講稿；1936年他參與《質文》編委會與同人討論「國防文學」問題；同年6月他參加任白戈等中國旅日進步青年舉辦的「高爾基追悼大會」；繼而11月又參加「魯迅追悼大會」，由此可見郭沫若與支盟成員交往之密切。1937年5月郭沫若出席左聯東京支盟成員返國前的一次餐會時，對大病後的林煥平十分關心，親自爲他按脈、量體溫，並叮囑他時刻注意，親愛之情溢於言表。[19]

---

[17] 同上註。

[18] 林煥平〈從上海到東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雜憶〉，頁691。

[19] 參見，《郭沫若年譜》1935至1937年記事。龔濟民（等），《郭沫若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33到1936年間，東京地區的中國留學生和僑民高達一萬二千人左右。因研究、留學或逃避國內政府壓迫左翼份子前來避難的進步文化人和學生，估計有500多人。[20]三〇年代的東京是中國左翼進步人士臥虎藏龍之地，在國內左翼文化運動日受壓制之後，左聯東京支盟成爲國內左翼運動的窗口之一而日益重要。[21]支盟活潑的活動，一直持續到盧溝橋事件爆發以前。1937年5月下旬，重要份子林煥平、林爲梁、任白戈、魏猛克、魏晉、張香山、林林等人，陸續被日本政府以反日作家名義驅逐回國，使支盟遭受嚴重打擊。[22]此後爲配合舉國一致的抗日形勢，支盟才隨著國內左聯的解散而劃上了休止符。

綜觀支盟三刊物成員：《東流》編輯前期有林煥平，後期有陳達人、魏晉、張香山等人。主要成員尚有林煥平、林爲梁、陳子谷（鵠）、駱劍冰、陳斐琴、麥穗、雷石榆、俞鴻模、歐陽凡海、陳一言、杜宣、蔣婉如、劉子文等人。《詩歌》編輯委員爲雷石榆、魏晉、林林、林蒂等人，其他成員尚有蒲風、陳子谷、澎湃、陳紫秋、蔡冷楓等人。《雜文》爲響應魯迅提倡的雜文精神而創辦的，專登小品和理論，魯迅也曾以匿名寄稿聲援。該誌編輯發行兼印刷者爲雷石榆、魏晉等人，杜宣擔任編輯，其他參與者尚有林林、魏猛克（一八藝社同人、魯迅培養的新人）、陳辛人、孟式鈞、林煥平、任白戈、刑桐華、張香山等人。[23]

依支盟情形可見，雜誌同人並不一定是盟員。盟員以中國人爲主，未見臺灣人參與；同人方面，依當年參與者回憶也無臺灣人。[24]因此吳坤煌、張文環應不是盟員，可能也非雜誌同人。不過從參與者回憶、誌面活動與發表記錄推測，吳坤煌即使不是盟員或同人，也是極重要的外圍關係者。張文環與支盟成員的關係較疏離，不過他應該也是除了吳坤煌之外與支盟成員發生過較多關聯的臺灣作家。

[20] 以上數據，參見蔡北華前述回憶。

[21] 譬如，魯迅在上海拜讀了郭沫若在《質文》上發表的文章之後非常高興。他認為，由於國內反動統治者的法西斯壓制，左翼作家的作品已很難發表出去，郭先生能出來發表文章是非常重要的。參見，《郭沫若年譜》，頁249-250。

[22] 林煥平〈從上海到東京：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活動雜憶〉，頁693。

[23] 關於東京支盟活動、三刊物內容，以及支盟成員與日本作家的交流情形，北岡教授曾做過相當詳實的研究。參見，北岡正子〈『日文研究』という雜誌（下）：左聯東京支部文藝運動の暗喻〉，前揭文，頁217-266。

[24] 張文環〈教育と娛樂〉，《臺灣日日新報》1937年11月30日、12月4日。依前後文判斷，引文中所指的「友人」應非中國留學生，筆者推測有可能是吳坤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吳坤煌、張文環與中國旅日青年的戲劇交流

吳坤煌、張文環與左聯東京支盟成員往來的契機是什麼呢？限於戰後臺灣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情勢，吳、張於公開場合對自己當年與支盟往來的情形所言甚少。然而一些蛛絲馬跡顯示，他們藉著東京交流之便以及戲劇活動與中國留日學生逐漸有深入接觸。以下，依序考察兩人與旅京中國青年接觸與交流的情形。

（一）張文環與中國留日學生

張文環早年發表的隨筆〈教育和娛樂〉（〈教育と娛樂〉，1937年）顯示，1934年左右他透過東京留學生團體曾與中國留學生有所接觸。他寫道：

> 應該是三、四年前的秋天吧？當時由東京留學生組織外交團體主辦，在東京報知講堂舉辦了「留學生同樂會」，招待中國留學生。我的朋友剛好是主辦單位的幹部之一，我不用幫忙卻有混入中國留學生中開開眼界的機會。看到友人們勤勤懇懇地站在場邊努力工作，覺得他們好辛苦。記憶中大會還計畫邀請戲劇方面某位知名人士來演講。[25]

在東京，張文環很自然的在各種場合接觸到中國留學生。當時張文環對中國留學生似乎頗感好奇，而且與個別中國學生已有一些交往。文中也提到，他曾與一對從北平大學前來研究日本文學的夫妻交往。這對友人曾向張請教如何欣賞日本傳統舞蹈及曲藝，他們一起去淺草曲藝場觀賞日本民謠、相聲、浪曲和舞蹈，也曾魚雁往返分享觀賞歌舞伎的心得。

除了張文環公開提起的留學生聯誼活動或北平大學的夫妻之外，張文環與蘇維熊之兄蘇維霖的交往，也可能使他接觸了一些中國人士。1946年蘇維霖攜眷返臺之前，除赴日進修的兩年之外，居住祖國長達23年。戰後他曾表示，他早年曾赴東京讀書，但是「因為民族意識在作祟，很不高興在日本念書，所以在正則補習學校補習功課的時候，越來越感覺不是味道，終於決意還回祖國讀書。」1921年他先後就讀上海的英文補習學校和南京暨南大學，1922年北上就讀北京大學預科和哲學系。1928年畢業後，輾轉在上海暨大附中、河

[25] 張文環〈教育と娛樂〉，前揭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省立第四師範、國立北平大學附中任教。居留北平期間，他與旅居北平的臺灣人洪炎秋、張我軍、連震東等人經常聚會，一起上澡堂、吃飯、聽戲。1935年春他赴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進修心理學，1937年5月左右重返北平。抗戰爆發後他擔任情報翻譯工作，隨國軍輾轉重慶、桂林等地。[26]

對個人生涯頗多憶述的蘇維霖，唯獨對東京之行未曾多談，因此無法得知他在東京的活動與交友狀況。不過當時在東京留學的張文環堂弟張鈥漢曾提到，1935年蘇維霖來京時，張文環與蘇氏兄弟過從甚密。蘇維霖因爲長年在中國留學友人甚多，在東京時常與旅日中國學者或留學生來往，以他爲中介張文環認識了不少中國人士。張文環和很多中國來的留學生都感情不錯，交往友人中有些後來成了中共要人。[27]蘇維霖旅日之前任教於北平大學附屬中學，前述張文環於文中所敘的北平大學夫婦，或許也與蘇維霖有關。另外，劉捷曾提到1936年秋他和張文環因人民戰線事件餘波被捕時，在東京本鄉本富士警察署拘留所發現蘇維霖也遭難。[28]牢獄之災或許是蘇氏不愛提及東京往事的原因之一吧？蘇維霖被捕原因不詳，據劉捷說僅關數日而已。比較張、吳、劉等人被捕的情況，蘇案並不嚴重，或許與他和中日（左翼）人士頻繁的往來有關。

（二）吳坤煌與日本左翼戲劇界及中國留日學生戲劇團體

張文環與中國友人的往來見諸文獻者不多，吳坤煌則留下較多線索。吳坤煌與左聯東京支盟人士的因緣又如何呢？主要是因爲戲劇活動和詩的交流。首先，從戲劇活動說明之。

1931年初到1932年同好會檢舉事件爆發之前，吳坤煌由於結識林兌而奔走於垂危的東京臺灣人左翼運動。檢舉事件落幕後，隨著同好會的重建轉型，他也逐漸從運動青年蛻變成文學青年。就在著手重建組織的時期，他同時對戲劇與文藝產生了興趣。此時的他除了與張文環、蘇維熊、巫永福等人致力於創立臺灣藝術研究會與發行《福爾摩沙》之外，也因謀生關係出入築地劇場。

築地小劇場爲日本實驗新劇與左派戲劇之重鎮。1924年由小山內薰（1881-1928，戲劇家、小說家）成立，因劇場設於東京築地二丁目得名。該劇團以新劇爲主，注重吸收西方表演藝術，具實驗性之非商業風格。初期上演均爲歐洲劇目，1926年以後才開始上演本國戲劇。1929年劇團分裂，激進成員

[26] 參見，蘇薾雨（維霖）〈祖國廿五年回憶錄〉《傳記文學》27卷1、2期；以及《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市政府，1997年12月）。

[27] 1999年3月13、28日，張鈥漢口述，柳書琴採訪。不過張先生已無法道出姓名。

[28] 劉捷《我的懺悔錄》（臺北，農牧旬刊，1994年），頁52-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土方與志領導另立「新築地劇團」，舊團體則改稱「劇團築地小劇場」（簡稱「築地小劇場」）。不過彼此仍保持合作，「新築地劇團」、「築地小劇場」與「左翼劇場」曾合組「新興劇團協議會」，1930年參與日本無產階級演劇同盟，共同推動新戲劇運動。1933年以後「新築地劇團」受到政府壓制，土方被迫出走法國、蘇聯，1940年主要成員遭逮捕而解散。「築地小劇場」也於1940年受當局命令改稱「國民新劇場」，1945年毀於戰火。

旅京文藝青年對於築地劇場並不陌生，1932-1935年就讀於明治大學的巫永福，也常跟隨教授出入築地小劇場上課或觀戲。[29]吳坤煌自1932年同好會事件被捕輟學之後經濟無著，有兩年半期間在築地小劇場當臨時演員，因此逐漸有正式演出的機會。劉捷等人也曾在吳坤煌介紹下串場打工，「到製片場當臨時演員，一方面賺些外快，一方面接觸一些電影藝術的工作人員。大夥熱情澎湃，樂此不疲。」[30]1933年2月15日，東京左翼劇團根據國際革命演劇同盟（簡稱「莫爾托」） 指揮，在築地小劇場舉辦莫爾托日記念演劇會，並訂25、26日舉辦兩天遠東民族之夜。吳坤煌獲朝鮮人金波宗主持的左翼劇團「三一劇場」支持，在築地小劇場參加演出〈出草智〉、〈搗杵手〉、〈霧社之月〉等臺灣舞蹈及民謠。此次演出的成功，也奠定了臺灣藝術研究會「民族藝術研究機關」的基礎。[31]

《福爾摩沙》創刊號封面爲吳坤煌繪製，第一、二號上他也分別發表了鼓舞女性戰鬥的隨筆與有關臺灣鄉土文學的精采議論。不過各方人士匯聚的築地劇場，顯然比《福爾摩沙》更吸引他，爲此他曾一度疏離臺灣藝術研究會的故鄉同好們。對此連好友張文環也不太能諒解，他曾以「臺灣人放尿不作堆」一語對吳坤煌、施學習的脫退表示失望。[32]戰後吳坤煌說到自己與中國留學生的淵源，表示這正是當年脫離《福爾摩沙》的原因之一。他說：

[29] 參見，巫永福〈思想起〉，《巫永福全集》第6輯（臺北，傳神福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5月），頁28。巫永福當時也參與校內演劇研究會，並參加一些演出。吳、巫在回憶中都簡稱「築地小劇場」，因而無法確定他們指的是「新築地劇團」還是「築地小劇場」。

[30] 劉捷（著），林曙光（編譯），《臺灣文化的展望》（高雄，春暉出版社，1994年），頁9-10。原書1936年出版時被禁止，1994年出版中文版時，作者又增加了一些補述。

[31] 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臺北，南天書局，1995年6月 二刷，復刻本），頁67。

[32] 〈編輯後記〉，《フォルモサ》第3號，1934年6月，頁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我在「福爾摩沙」第三號發行前，離開了他們，與文環兄較為疏遠緣由，簡言之，一來種種想法與作法不同，二來我參加了日本新戲劇運動，並在東京築地小劇場受訓練，再者，當時來日研究文藝的眾多中國大陸的戲劇家，各方面的文學作家，留學生都要我做他們的橋樑，教日語、翻譯工作，參觀活動等等，教我無暇去參涉一本非大眾化的雜誌了。[33]

吳坤煌在同好會重建過程中與張文環一起堅持穩健路線，從而使同好會成功轉型爲臺灣藝術研究會；然而他的社會主義信仰始終表露於言論之中，未曾有大改變。吳從運動轉至文藝的經歷，在眾多對社會主義運動涉入不多、或完全未涉入的同人中較爲特殊，他的背景與思想傾向也使他漸漸無法滿足於《福爾摩沙》的穩健路線。他在1934年6月或稍早以前脫離，1935年2月「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話會」舉辦時歸來領隊，脫離時間並不長。脫離期間適逢左聯東京支盟負責人林煥平抵京（1933年9月）、中國青年陸續匯集的時期，此後吳坤煌熱衷與中國左翼青年交往，參與中國留學生的演劇或藝文活動，在那裡找到更適合自己思想、立場的舞臺，從而調整了一度穩健是尚的活動方向。

在與中國旅日青年之戲劇交流方面，吳坤煌表示他曾參與〈洪水〉、〈雷雨〉、〈五奎橋〉等劇的導演工作。[34]依北岡正子的研究，這些都是旅京中國留學生演劇團體於1935至1936年間代表性的演出。譬如，曹禺〈雷雨〉（1935年4月、5月）及洪深〈五奎橋〉（1935年10月），爲「中華同學新劇公演會」的名作。[35]「中華同學新劇公演會」與「中華戲劇座談會」、「中華國際戲劇協進會」，爲當時東京三大中國留學生演劇團體，三者後來聯合爲「中華留日戲劇協會」，簡稱「劇聯」。另一齣吳坤煌參與田漢〈洪水〉（1936年5月）一劇，便是「中華留日戲劇協會」的力作。

「劇聯」與當時簡稱「左聯」的「左聯東京支盟」，以及其他旅京中國左翼團體，諸如「社會科學左翼聯盟」（社聯）、「世界語左翼聯盟」（語聯）、「中國留日學生會」（學聯），皆有聯繫。左聯東京支盟部份成員，也

[33] 吳坤煌〈懷念文環兄〉，《臺灣文藝》81期，1983年3月，頁76-77。

[34] 謝霜天〈再出發的詩人——訪吳坤煌老先生〉，《中央月刊》第14卷第7期，1982年5 月，頁90。

[35] 北岡正子〈『日文研究』という雑誌（下）：左聯東京支部文藝運動の暗喻〉，頁264-265。這些戲當時都在一橋講堂演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參加了劇聯、社聯、學聯、語聯等組織。[36]吳坤煌參與導演的上述演出，多半爲多人共同導演，中國旅京戲劇團體擔任演出，左聯東京支盟部份成員也有參與。譬如，在東京轟動一時的〈雷雨〉演出時，除了吳坤煌以外，支盟成員之一、《詩歌》同人、同時也是「中華戲劇座談會」成員之一的杜宣，也參加了導演工作。郭沫若爲中國旅日戲劇團體的指導者與支持者，〈雷雨〉演出時他曾到場鼓舞，演出後並在支盟刊物《東流》上發表觀後感多所期勉。1937年7月曹禺〈日出〉公演時，他也與秋田雨雀一致讚美劇本和演員。[37]

1935-1936年間劇聯主演的戲劇活動極爲頻繁，熱絡一時。「劇聯」除了受郭沫若關切指導，也受到日本「新協劇團」和「新築地劇團」左翼人士的協助。[38]「新協劇團」是除了「築地小劇場」之外，討論30年代旅日中、臺青年戲劇活動時不可忽略的另一重要團體。「新協劇團」與「新築地劇團」，都爲當時著名的左翼劇團，彼此之間也有交流。「新協劇團」由村山知義於1934年倡議成立，1940年奉當局之命被迫解散。六年之內該劇團以實現「新劇團的大團結」爲目的，團結了許多左翼劇作家和演員。主要成員有久保榮、藤森成吉、秋田雨雀、久板榮二郎……等人，成員大多有參加左翼文藝運動的經歷。〈雷雨〉演出時，「新協劇團」事務長秋田雨雀、重要份子藤森成吉（1892-1977，左翼小說家、劇作家）等人皆蒞場鼓勵。[39]

在支持中國旅日劇團的日籍人士中，秋田雨雀可以說是中國演劇青年最重要的顧問和支持者。秋田曾於1927-1928年應邀訪問蘇聯，返國後停止創作，30年代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擔任「新協劇團」事務長一職。除此之外，秋田也擔任「國際文化研究所」所長及「日本世界語同盟」委員長，林煥平、蔡北華等人也提到秋田曾參與「劇聯」和「語聯」活動，對中國旅日青年的各式活動多所支持。

吳坤煌與秋田雨雀等日本劇壇名人相識甚早，可能淵源於築地劇場時期。據北岡指出，吳坤煌曾受村山知義、秋田雨雀、丸山定夫指導。[40]這些人士屬

[36] 蔡北華〈回憶東京左聯活動〉，頁700-701。

[37] 參見，《郭沫若年譜》，頁255、278。

[38] 北岡正子〈『日文研究』という雑誌（下）：左聯東京支部文藝運動の暗喻〉，頁255。

[39] 參見，蔡北華、林煥平前述回憶。另外，藤森成吉1928年曾任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首任主席，1930年以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納爾普）身份，代表赴蘇聯出席「國際革命作家同盟」第二次國際會議。

[40] 北岡正子〈『日文研究』という雑誌（下）：左聯東京支部文藝運動の暗喻〉，頁2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新築地劇團」和「新協劇團」。1935年後他不僅參加中國旅京戲劇團體的活動，也活躍於日本左翼劇團。「新協劇團」成立後曾推出村山知義根據島崎藤村小說改編的〈黎明前〉、久板榮二郎〈東北風〉、歌德〈浮士德〉等代表作。吳坤煌便曾參加〈浮士德〉與〈黎明前〉的演出。[41]吳坤煌從1932、1933年左右開始，因參與東京地區左翼劇壇的機緣與日本左翼劇團、在日鮮人演劇團體及中國旅日戲劇組織有所接觸，1935年以後逐漸邁向個人戲劇活動的高峰期。此時的他同時參與了日本「築地小劇場」、「新協劇團」與「中國留日戲劇協會」諸團體的演出。放眼文聯東京支部幾乎未有比吳坤煌更深入戲劇活動者。1936年《臺灣文藝》遭遇分裂危機力圖以多元發展振作時，曾派劉捷赴京「協助支部會員，設立支部所屬演劇研究會」[42]。如果此事屬實，那麼能讓文聯產生如此的跨域野心並寄予重望者，應該也與吳坤煌的活躍有關吧？

吳坤煌可能在1932、1933年之後在築地小劇場打工接觸了日本劇壇人士，同時逐漸結識一些從中國來的戲劇人、學人或文藝青年，因此奠下了1933、1934年左右與「左聯東京支盟」成員結識的機緣。1934年以後他與左聯東京支盟成員的交往交流見於文獻（容後述），在詩刊中可以發現除了戲劇活動之外，他在詩方面與日本左翼詩壇及中國旅日作家的交流亦是可圈可點。

三、吳坤煌與《詩精神》、《詩人》集團及左聯東京支盟的詩交流

如上所述，旅京中臺青年的戲劇交流乃建立於日本左翼劇壇既有的跨域交流基礎之上。正如戲劇界的情況，中臺青年的詩交流也受惠於日本左翼詩壇的既有環境。所不同的是，戲劇交流限於現場演出的藝術型態無法影響臺灣，文學交流透過出版物之載體則能較直接地對偏遠的南國文壇產生推波助瀾的效果。《福爾摩沙》系統作家除了與旅日友人切磋琢磨，與故鄉文壇遙相勉勵之外，各成員也因不同領域的興趣或機遇，而與劇壇、文壇、樂壇之日本文化人或旅日中國人士有所交流。在小說的領域，張文環與日本左翼作家平林彪吾等人有所交流[43]；在詩壇交流方面，最爲活躍者則爲吳坤煌。在正式討論「文聯

[41] 謝霜天〈再出發的詩人——訪吳坤煌老先生〉，前揭文，頁91。

[42] 同上註。另外，參照劉捷回憶錄發現，此事可能也與劉捷等人欲在海外發行一名為《臺灣情報》之刊物有關。

[43] 參見，柳書琴〈荊棘的道路：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清華大學中國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京支部」與「左聯東京支盟」的具體交流之前，本節將以吳坤煌爲例，梳理臺灣旅日文藝青年與日本左翼文壇、中國旅日作家之間的淵源。

（一）吳坤煌與日本左翼詩壇及中國留日學生詩人團體

吳坤煌除了透過戲劇活動和中、日劇界人士有所交流之外，同樣透過詩的交流與中、日左翼文壇有所往來。他與左翼戲劇界的接觸較早，與左翼詩壇的往來則淵源不詳，可能也與左翼演劇人士的往來有關。譬如，秋田雨雀、藤森成吉等人皆同時跨足文學與戲劇，中野重治也是詩人兼小說家。

除此之外，王白淵對他的影響也值得注意。王白淵在1920年代後期逐漸左傾，1930年代《荊棘之道》（《蕀の道》）壓卷詩篇與1933年以後發表於《福爾摩沙》的一些詩，顯示其左翼詩人面貌已趨成熟。雖然目前學界所知有限，但是他離開日本前已有相當成熟的創作能力、曾與盛岡文士交流、與宮崎賢治（1896-1933，詩人、童話作家）也可能有刊物上的接觸，因此他赴華以前極可能與日本詩壇或詩人已有接觸。赴滬初期王白淵曾寄稿回《福爾摩沙》刊載，但《臺灣文藝》發刊後便不再有署名「王白淵」的稿件發表。

王白淵赴華後與臺、日作家是否保持聯繫？他赴華後是否曾繼續與日本詩壇保持接觸？這些都是探討王白淵個人文學活動，乃至他對《福爾摩沙》同人的影響時遭遇的瓶頸。不過一些線索顯示，他赴華後仍以通訊方式與島內雜誌或日本左翼文藝雜誌保持聯繫。譬如：《臺灣文藝》創刊號〈文藝同好者氏名住所一覽〉中，有「王白淵氏　上海」的記錄，1935年8月上〈本聯盟正式加盟者氏名〉中國欄下也有王氏大名。張深切甚至一度在1935年5月發行的《臺灣文藝》上表示文聯將借重王白淵設立「上海支部」。[44]可見王白淵相當早便加入了文聯，而且一直維持著聯繫。此外，日本普羅詩刊《詩人》（《詩精神》後身）1935年12月的「全國詩人住所錄」中，仍可見王白淵姓名。[45]當時他是「中國、滿洲國」同人欄中唯一的臺灣人，通訊地址爲「上海中華民國郵政總局信箱」，除他以外的其餘五人全是日本人士。不論《臺灣文藝》或《詩人》名錄中，王白淵均未詳細提供通訊住所，對於居處的暴露似乎有所顧

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7月），頁249-277。

[44] 張深切〈「臺灣文藝」的使命〉，《臺灣文藝》2卷5號，1935年5月5日，頁19。

[45] 〈全國詩人住所錄〉，《詩人》3卷1號，1936年1月，頁164。該名錄臺灣部份者，有秋元貞造、黃金富、呂石堆（赫若）、西川滿、後藤大治等五位。可見呂赫若對日本詩壇也相當注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慮，這一點可能與他加入帶有情報任務的華聯通訊社有關。故而，表面上王白淵淡出文壇，實際上與臺、日文藝同好之間仍有某些聯繫，甚至可能易名發表。[46]

吳坤煌因學運風波赴日、旅日後出入社會運動，這些經歷都使他比其他旅日同儕更具左翼色彩。他與林兌兩人甚早接觸王白淵，從他發表的一些評論觀之，《福爾摩沙》諸人之中屬他最能繼承王氏社會主義思想與詩觀。從吳坤煌詩創作的萌動過程觀之，王白淵甚至堪稱吳坤煌詩作的啓蒙者之一。

1933年吳坤煌與友人創辦《福爾摩沙》之後，開始有隨筆與評論發表，不過從未有小說或詩的發表。1934年以後他一邊出入築地小劇場，一邊開始將王白淵的詩推薦到創刊未幾的普羅詩刊《詩精神》上，隨後也在該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詩〈烏秋〉。吳坤煌在島外的詩活動，已知者大致如下表：

	篇名	作者、譯者	發表狀況	發表時間
轉介	上海雜詠	王白淵（作）日文 吳坤煌（選）	（臺）《フォルモサ》第2號 （日）《詩精神》1卷3號	1933.12.30 1934.6.1
轉介	行路難	王白淵（作）日文 吳坤煌（選）	（臺）《フォルモサ》創刊號 （日）《詩精神》1卷5號	1933.7.15 1934.6.1
詩	烏秋	吳坤煌　日文	（日）《詩精神》1卷5號	1934.6.1
評論	現在的臺灣詩壇	吳坤煌　中文	（中）《詩歌》1卷2號 1卷4號	1935.8 1935.10
譯詩	鹽	林林（作）　中文 吳坤煌（譯）日文	原作發表刊物不詳 《詩精神》2卷8號	 1935.9.1
評論	臺灣詩壇の現狀	吳坤煌　日文	（日）《詩人》3卷4號	1936.4.1 註：與前列〈現在的臺灣詩壇〉同稿。

註：《詩精神》、《詩人》爲同一系統之日本普羅詩刊，《詩歌》爲左聯東京支盟詩刊。

[46] 依筆者調查目前已能確定的王白淵筆名或化名有，戰時「王博遠」、「洗耳洞主人」與戰後「王溪森」等。此外，1933年謝春木主持「華聯通訊社」時更名謝南光。1936年賴貴富與王白淵等人在上海從事抗日宣傳，將反戰、反日稿件翻譯為日文後，多以化名寄往日本左派刊物登載。此都證明王白淵有可能以其他名號，與日、臺，甚至中國詩壇保持某些接觸，有待進一研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依上表可見，1934年是吳坤煌詩創作的萌動期，其詩心的萌動似乎多少受惠於王白淵和中國旅日詩人的影響激盪。當時他同時致力於與中、日詩壇的交流。前述林林提到「臺灣朋友又選擇較好的作品譯為日文，送到日本文學雜誌上刊登」，這位「臺灣朋友」正是吳坤煌。

戰後吳坤煌在「橋副刊」舉辦的「如何建立臺灣新文學」茶會中，也曾提到他與中日人士的交流。會中吳坤煌特別指明旅京臺灣文藝運動在臺灣文學史上締造的成就，以及肇始團體「臺灣藝術研究會」在這一段海外文藝運動中的重要性。不過他似乎有意避稱「左翼人士」或「左聯東京支盟」，對於左翼文化人遭受的「壓迫」一語帶過。僅以進步文人的互動，輕描淡寫地交代了一群左翼文化人當年的野心。他說：

> 我們以前在東京時，組織過臺灣文藝研究會（按，臺灣藝術研究會）出版三期雜誌，有這個基礎我們造出不少事。但受了日人的極大壓迫，不過幸而有一些日本進步文人給我們極大的同情和幫助所以我們和他們很合作，後來我就以嫌疑被監禁起來，有的跑到內地去。這算是臺灣文藝運動的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頁。關於我們在東京工作情形特別值得一提的便是與剛木先生等的合作，那時內地來的林煥平先生詩人蒲風等都參加我們這個團體，他們很同情我們，因為他們也受到壓迫，所以大家都有「同病相憐」的感覺。[47]

從吳坤煌的回顧可知，當時文聯東京支部與日本進步文人以及左聯東京支盟主持人林煥平、《詩歌》雜誌重要成員蒲風等人確有交流。而且「剛木先生」[48]、林煥平、蒲風等人，似乎也曾參與、支持文聯東京支部的一些活動。

30年代中期的日本左翼詩壇，是以日本左翼詩人爲中心的多國族左翼詩人共同活動的平臺。來自殖民地的青年作家吳坤煌也在其中，發展自己的創作活動與文學網絡，並將此資源回饋到島內，促成中國旅日左翼作家對臺灣文壇的交流與關注。現有調查中尚未發現支部成員與「剛木先生」、林煥平、蒲風等

[47] 吳坤煌〈希望大家能打破這目前文藝界的沈寂〉，《新生報》，1946年4月7日。

[48] 有關「剛木先生」線索太少難以查證。有可能是左翼詩人岡本潤（1901-1978）。岡本於1920年參加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在《熱風》雜誌發表反對現實的詩歌，1923年與壺井繁治等創刊《紅與黑》，主張詩歌改革。他1933年出版的詩集中反對強權和獨裁，表現無政府主義者的激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交流的具體事跡，不過吳坤煌與支盟另一位活躍份子雷石榆的交流，卻有許多線索可供佐證，特別在《詩精神》與《臺灣文藝》雜誌上。

（二）東京左翼詩壇中的吳坤煌與雷石榆

吳坤煌與雷石榆以東京左翼詩壇爲中介的交流，開始於1934年間。1934、1935年間吳坤煌參與《詩精神》集團諸多活動，包括日本左翼詩人「遠地輝武出版記念會」（1934年10月3日）、日本左翼詩人作品合集「《一九三四年詩集》出版記念會」（1934 年11月13日）、以及雷石榆日文詩集「《沙漠之歌》刊行記念會」（1935年4月7日）等。在這幾次以《詩精神》日本作家爲主的記念會中，除了來自臺灣文聯東京支部的吳坤煌之外，還有另一位特別的參與者亦即中國左聯東京支盟的雷石榆。吳、雷側身於眾多日本作家之中致力於交流，祖國青年與臺灣青年，在此結下深厚情誼。在臺、中、日左翼文學者交流活動中，他們的身份帶有邊緣性卻又具有一定代表性，顯得格外特殊。

《詩精神》雜誌對《一九三四年詩集》出版記念會及雷石榆《沙漠之歌》刊行記念會，略有記載。《一九三四年詩集》出版記念會，以江口渙演講開場，出席者36名，包括《詩精神》同人及其他知名詩人多人。[49]詩刊上的活動記錄中，還特別強調「又雷石榆、吳坤煌、朱永涉等中國及殖民地諸君的氣勢也使此會增色不少。」[50]《沙漠之歌》刊行記念會，從遠地輝武的演講開始至北川冬彥的演講作結，與會者除了《詩精神》同人植村諦、後藤郁子等人之外，還有左聯東京支盟詩人林林、陳子鵠、魏晉、蒲風、林煥平，滿洲國駱駝生及臺灣吳坤煌等人。從誌面上的記錄可見，在這些以日本左翼作家爲主的詩集出版會場合，雷石榆、吳坤煌等中臺文藝人士的參與及表現也受到矚目。除了上述幾個記錄較詳的出版會之外，臺灣作家可能也參與了其他出版聚會或《詩精神》同年記念會、懇親會等。譬如，匯聚詩人、小說家、評論家、畫家、勞動者80餘名參加的「《小熊秀熊詩集》《飜ぶ橇》出版記念會」（1935.7.1），據載便有中華民國、臺灣、朝鮮多人參與。[51]雷石榆是其中之一，吳坤煌很可能也有參加。

吳坤煌、雷石榆當時均爲《詩精神》同人，在以日本作家爲主的集團中，

[49] 譬如，有中野重治、窪川鶴次郎、北川冬彥、土方定一、植村諦、本庄陸男、森山啟、後藤郁子、新井徹、小熊秀熊、高橋新吉等人。次年該團體繼續推出《1935年詩集》（前奏社，1936年1月），雷石榆詩〈故國を離れて〉也被收錄其中。

[50] 此為〈一九三四年詩集出版記念會〉於《詩精神》雜誌上的活動記事。

[51] 北岡正子〈雷石榆『沙漠の歌』：中國詩人日本語詩集〉，頁2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們極可能是唯一的臺灣人或中國人，因此兩人的身份是特殊的。吳坤煌似乎比左聯東京支盟的中國作家更早就接觸了日本左翼文壇。他比雷石榆早在該誌發表作品，隨後也幫忙譯介中國旅日作家的作品。雷石榆接觸日本左翼詩壇的時間稍晚，不過根據北岡正子研究日後他與《詩精神》同人的交流相當深。雷石榆與新井徹、後藤郁子、遠地輝武、小熊秀熊等人交往密切，也曾多次參與該集團諸如同人著作出版記念會、詩精神懇親會等集會。這些集會都是以茶話會的形式舉行座談，會費50錢，除了同人以外也邀請其他左翼作家和評論家出席。依雷氏回憶，當時便曾邀請秋田雨雀、中野重治、窪川鶴次郎、岡本潤、槙木楠郎、藤森成吉、德永直、森山啓、江口渙等人與會。[52]這些日本文士彼此多爲朋友，他們與中國旅日文藝人士也都有接觸。譬如，秋田與江口彼此是好友，他們與前支盟的胡風等人都有接觸，與郭沫若也有往來。[53]秋田、藤森也曾投稿支盟刊物《質文》。

吳坤煌與雷石榆兩人結識左翼詩人遠地輝武的出版記念會，也是茶話會場合。[54]此後雷石榆與吳坤煌結下不淺之緣，雷石榆曾說：「我與吳坤煌君認識了以後，《臺灣文藝》才親熱地和我訂了姻緣。」[55]雷石榆晚年曾提到自己與《臺灣文藝》的這一段文學因緣，說道：

> 與參與"左聯"東京支盟同時，我參加了日本左翼詩歌雜誌《詩精神》，是同人中唯一的中國人。這樣，我在中國的詩歌營壘，參加愛國反侵略的鬥爭，而在日本的詩歌營壘，參加國際主義的反法西斯的鬥爭。又通過我在這兩方面的活動，既支持臺灣進步青年的文藝活動（通過吳坤煌等編輯的《臺灣文藝》雜誌），又為中日文化交流，加深兩國人民友誼盡了棉力。[56]

雷石榆是左聯東京支盟文學者中的活躍者，當時他以支盟爲中心同時參與日、中左翼詩人團體的活動。透過吳坤煌引介，這位中國詩人也與臺灣作家結緣，吳坤煌的活躍也令他印象深刻。

---

[52] 北岡正子〈雷石榆『沙漠の歌』：中國詩人日本語詩集〉，頁221-222。

[53] 參見，鷲巢益美等（譯），胡風《胡風回想錄》（東京，論創社，1997年2月）。

[54] 此係遠地輝武出版《近代日本詩の史的展望》及《石川啄木の研究》兩書之記念會。

[55] 雷石榆〈我所切望的詩歌〉，《臺灣文藝》2卷6號，1935年6月，頁123-126。

[56] 雷石榆〈我在"左聯"時期的活動〉，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會址記念館、上海魯迅記念館編《左聯記念集1930-1990》（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年2月），頁2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吳坤煌除了促成雷石榆與《臺灣文藝》集團交流，還介紹支盟另一位重要成員魏晉投稿。雷石榆詩集《沙漠之歌》出版後不久，魏晉便將詩集中〈給某詩人們（祖國的感想之一）〉譯爲中文，隨後又發表〈最近中國文壇上的大眾語〉一篇。兩文分別刊載於《臺灣文藝》2卷6號、2卷7號上。[57]魏晉一文開頭便寫道：「承吳君的盛意，我像在夢中似的，讀到了《臺灣文藝》。」吳坤煌以《臺灣文藝》爲舞臺致力於中臺作家交流，可見一斑。

中國青年雷石榆、魏晉等人熱情參與文聯東京支部，相對地臺灣青年也可能參與了他們的座談會或其他活動。張文環〈臺灣文壇之創作問題〉發表於《雜文》，吳坤煌〈現在的臺灣詩壇〉刊載於《詩歌》。臺灣作家於兩刊初創之際便有意從小說和詩方面分別介紹臺灣文壇現狀，可見彼此交流之積極。以當時的情況推測，張在《雜文》上有目無文的稿子，極可能是吳居中介紹的，此一殘跡多少也爲中臺青年的異域交流作了見證。

在旅日作家努力下，不僅中臺文學者的交流日益拓展，日本左翼詩壇與中、臺詩人的互動也漸次增加。1935年初雷石榆在《詩精神》上發表〈中國詩壇の近況〉進行介紹後，中日詩人交流日漸頻繁。1936年9月《詩人》推出雷石榆等「中國青年詩集」，並公開募集中國青年詩稿，持續至次號不歇。在臺日交流方面，吳坤煌在《詩歌》上發表〈現在的臺灣詩壇〉後，又將同稿譯爲日文發表於《詩人》（參見前表），同樣致力於臺灣詩壇的介紹。終於在日益熱絡的跨域交流之下，1936年4月號《文學案內》以「朝鮮、臺灣・文學的將來Ⅰ」特輯，登載了楊逵的作品。該誌次月號（2卷5號）又推出「臺灣詩抄」小欄，轉載葉冬日〈烏秋〉、楊啓東〈朝の市場〉兩詩。[58]雖然這些作品的轉載可能是楊逵促成的，不過即便如此也無損於吳坤煌開風氣之先、推動交流氣運之貢獻。[59]

[57] 雷石榆（作）、魏晉（譯）〈給某詩人們（祖國的感想之一）〉，《臺灣文藝》2卷6號，1935年6月，頁131。魏晉〈最近中國文壇上的大眾語〉，《臺灣文藝》2卷7號，1935年7月1日，頁193-194。

[58] 兩詩發表及轉載情況如下：

作者	篇名	原發表刊物	時間	轉載情形
楊啟東	朝の市場	《臺灣文藝》2卷2號	1935.2.1	《文學案內》2卷5號、1936年5月
冬日	烏秋	《臺灣文藝》2卷3號	1935.3.5	同上

[59] 依筆者調查所見，吳坤煌與日本詩壇的交流集中於《詩精神》、《詩人》兩誌，楊逵則與《文學案內》、《文學評論》等誌較有交流，因此上述作品的轉載較可能出自楊逵推薦。楊逵與日本左翼文壇的交流所憑著的管道與模式則與本文所討論的吳

臺灣人文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1934年《詩精神》譯介活動爲始，吳坤煌在《詩精神》上發表了第一首詩，此後發表不輟。以《臺灣文藝》所見，1934年12月到1936年8月之間，他總共在該刊上發表了七次。此外他還先後與日本普羅詩刊《詩精神》及左聯東京支盟刊物《詩人》等團體交流，也曾在這些詩刊上向中、日文藝人士介紹臺灣詩壇。1935年9月，他還曾在《臺灣新民報》上爲文批判島內詩壇並引發迴響。（容後述）1937年春以後吳坤煌被捕，拘禁10個月以後被日本政府遣返，回臺後透過在《風月報》工作的張文環謀職，不久後赴華謀生。他赴華之後的情形不詳，戰後則被文友誤爲棄文從商，而漸離文學之道。[60]因此，1934到1936年間極可能是他創作活動的巔峰期。這個時期他不僅開始嘗試發表詩，與日本左翼詩人及中國旅日詩人也展開了具體交流；他與日、中左翼文學者的接觸交流，也開啓了帶有左翼色彩的臺／中／日作家交流的機緣。

四、「文聯東京支部」與「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東京支盟」的交流

「文聯東京支部」與「左聯東京支盟」以吳坤煌與雷石榆的交流，構築了臺灣文壇、旅日中國左翼文學者以及東京左翼詩壇之間的多邊互動。隨後，以東京支部爲接觸舞臺，以作品投稿爲途徑，吳、雷兩人的交流，開啓了中國旅京左翼作家與他們所陌生的臺灣文壇一段難得的接觸。1935年《臺灣文藝》上陸續出現了中國左翼青年作家的稿件，在中、臺新文學交流逐漸減弱的當時，這些爲數不多的中國青年左翼作家的來稿，卻無比激勵人心。

（一）雷石榆、魏晉等人與《臺灣文藝》

吳坤煌將《臺灣文藝》創刊號介紹給雷石榆之後，1935年2月雷便出席了文聯東京支部的首次茶話會。會中他還向臺灣同好報告了中國文藝界動態。當時日文還不甚流利的雷石榆，在賴明弘的翻譯下發表了如下感想：

坤煌等人不同，限於篇幅本文略而不論，相關研究可參考：垂水千惠〈臺灣新文學中的日本普羅文學理論受容：從藝術大眾化到社會主義〉，「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究會」，中研院文哲所，2004年7月15-16日；垂水千惠〈為了臺灣普羅大眾文學的確立——楊逵的一個嘗試〉，收於柳書琴、邱貴芬主編《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市：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年4月）。

[60] 參見，吳坤煌〈懷念文環兄〉、謝霜天〈再出發的詩人——訪吳坤煌老先生〉等憶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臺灣文藝》這本雜誌我翻了，但沒有全部看完。我很敬佩各位的努力。臺灣現在的文藝雜誌跟以往不同，有新的意識，立場也不限於臺灣，需要跟中國合作，事實也在互相合作前進。[61]

雷石榆對於《臺灣文藝》創刊號的內容似乎興趣不高，不過對於該誌的立場、主張與野心略有了解，而且相當肯定《臺灣文藝》「立場不限臺灣」、「與中國合作前進」的方向。自《福爾摩沙》時期開始，「立場不限臺灣」便是旅京臺灣文藝青年的共識，而「與中國合作前進」則是文聯東京支部野心勃勃的重點工作。反帝、反戰、反侵略的理念，使中國左翼作家雷石榆與臺灣反日作家相契而聲氣相通。

雷石榆與臺灣作家的交流，以《臺灣文藝》爲舞臺展開。1935年4月起《臺灣文藝》上不斷刊載雷石榆作品，總計有詩作4篇、詩評2篇、通信1篇、小說1篇。從他發表的諸多文稿中可見，當時雷石榆與文聯東京支部相當親近，透過《臺灣文藝》他對島內作家有所認識並提出建言，對島內作家也相當關心。

《臺灣文藝》2卷6號（1935年6月）除了刊載雷石榆〈給某詩人們（祖國的感想之一）〉之外，還刊出了他對《臺灣文藝》2卷4號（也就是雷石榆稿件首次刊出該期）的詩評。在這篇〈我所切望的詩歌—批評四月號的詩〉文中，雷石榆除了對吳坤煌〈悼陳在葵君〉一詩讚譽有加之外，對楊守愚、吳坤成、巫永福、翁鬧、楊華、子敬、管頂人等詩，不是褒貶相摻便是不肯定。他對《臺灣文藝》詩歌滿是「悲觀、傷感、戀愛的醉吟、身邊瑣事雜唱」不甚欣賞，對臺灣詩人缺乏社會主義人生觀及欠缺唯物辯證法的思考方式，也委婉批評了一番。他寫道：

> 臺灣的作家們啊！詩人們啊、體驗得比我觀察更明晰的壓在你們的頭上的現實的枷鎖、和在那枷鎖下的大眾生活，以及和世界的矛盾尖銳化的現階段的種種關係不可分離性底諸樣事象不是清清楚楚的纏在你們的身邊麼？然而作為詩人的你們、為什麼在無數的現實的題材的棚下隱著身低唱著時代無關痛癢的調子呢？[62]

---

[61] 〈臺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話會〉，《臺灣文藝》2卷4號，1935年4月1日，頁27。

[62] 雷石榆〈我所切望的詩歌——批評四月號的詩〉，前揭文。本稿為中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雷石榆呼籲臺灣詩人勇敢表現「大眾生活」、「社會事件」，大膽創作「表現時代的現實作品」。他認爲儘管作家的藝術表現各有所長，只要透過「一致的世界觀」，便能創作出擁有「歷史的現實價值」的作品。

雷石榆基於左翼文學理念，在《臺灣文藝》上對臺灣詩壇發出的批評，隨即引發吳坤煌回應。八月吳坤煌在《詩歌》上發表〈現在的臺灣詩壇〉一文。他略有反駁之意地表示臺灣除了無病呻吟的詩人之外，並不是完全沒有凝視歷史進展，深入枷鎖下的大眾生活，企圖從社會矛盾中把握臺灣現實的詩人。譬如王白淵和他自己便是。對於王白淵，吳尤其推崇。不過他也承認整體而言，臺灣詩壇確實必須從困於現實泥沼翻身不能的懦弱醜態中掙出，停止長吁短歎，積極以世界性的普遍矛盾來掌握和表現現實才對。受此刺激，九月吳坤煌進而在《臺灣新民報》文藝欄中，對本土詩評界提出批判，因而引發了島內文壇的一些迴響。[63]他山之石雷石榆對臺灣詩壇的關心和批評引發的影響，可見一斑。

除了誌面上清楚可見的吳坤煌與雷石榆、魏晉等人的交流，以及吳於憶往中提及與林煥平、蒲風等人的合作之外，臺灣文藝聯盟與左聯東京支盟可能還有其他一些互動。《臺灣文藝》創刊不久，不斷刊載有關魯迅、高爾基、托爾斯泰等人的研究或作品的中譯稿。譬如：增田涉著、頑銕譯〈魯迅傳〉（連載4期）；高爾基著、宜閑譯〈鷹之歌〉；高爾基著、張露薇譯〈在輪船上〉；托爾斯泰著、春薇譯〈小孩子的智慧〉等。這些稿件似乎不盡出自臺灣青年之手，其來源不得不令人聯想到在左翼文學譯介交流上貢獻頗多的東京支盟中國青年們。

（二）文聯常委賴明弘拜訪郭沫若

1934年9月上旬，臺灣文藝聯盟發起人亦是常委之一的賴明弘，背負擴展文聯海外發展的任務，來到東京。[64]除了促進活動陷於停滯的臺灣藝術研究會

[63] 吳坤煌〈現在的臺灣詩壇〉，前揭文。吳在《臺灣新民報》上發表的批評筆者未見，此係他在〈現在的臺灣詩壇〉一文中所提及。文載：「九月『新民報』底文藝欄，吳坤煌所投的巨彈，動亂了詩底評論界，一些無定見的詩人們，提出反省和再出發，那是頗值得討論的問題。」

[64] 《新高新報》442、467號的〈編輯餘墨〉載有以下記事「本報漢文部編輯主任賴明弘氏，邇來身體漱弱，有害健康，是故乃辭厥職，欲渡內地，轉地靜養，本報諸同人，莫不為之惋惜。」、「元本報漢文部編輯賴明弘君，自去年九月初旬，抱遠志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島內臺灣文藝聯盟主導的文學活動合流之外，這位文聯常委還走訪了1928年亡命日本以後被中國旅日左翼青年奉爲指導者的郭沫若先生。依《臺灣文藝》2卷2號（1935年2月）相關文稿推測，透過曾於1933年5月拜訪過郭氏的臺灣旅日學生蔡嵩林[65]引介，賴明弘於1935年11月19日致信郭沫若，11月21日獲得允諾來訪之覆信，12月2日兩人興奮地拜訪郭寓。[66]此次拜訪之後，《臺灣文藝》獲得了郭沫若的稿件，刊物上對於郭老相關訊息的報導雖然低調，但是該集團以尋訪「指導者」爲目標，殷切期盼獲得指導的用心，卻清楚可見。

賴明弘致郭的信中，於介紹「臺灣文藝聯盟」成立目標及理想之後，深切表達了文聯人士對郭老賜稿與指點的願望。他如此寫道：

> 如上言我們現在祇痛感缺乏優秀之指導者，我們委員學識未宏，經驗又少，是以此後很盼望先輩諸公之指導和鞭撻。尤其是對素為我們崇仰之先生，我們很伏望多指示開拓臺灣新文學之處女地的方法和出路，使我們同一民族之文學能夠伸展而且能盡夠歷史的底任務！那麼，我們的任務之一，可謂完成了。[67]

信函顯示文聯常委賴明弘往見郭沫若乃爲取得中國左翼作家的指導或建言，以便讓「同一民族的文學」能夠交流、聯繫、拓展，從而恪盡「歷史的任務」。「歷史使命」或「歷史任務」等詞，爲當時左翼人士的慣用語。賴明弘所謂的「文聯的歷史任務」和吳坤煌「東京支部的歷史使命」，都隱含藉文學活動促進臺灣解殖、復歸祖國或建立社會主義國際等等涵意。以當時情況而言，「同一民族的文學」之聯繫伸展，較安全、便利的方式不外藉東京相對自

而負笈東都，在京研究文藝，稗益斯途不尠，此回歸來，仍在本報編輯部活躍。」參見，《新高新報》442號，1934年9月15日，頁13。關於賴明弘的最新研究，可參考，張雅惠〈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6月。

[65] 蔡嵩林，生卒年背景不詳。1933年時已旅日，不過仍與島內臺灣文藝協會成員有往來，並在《先發部隊》及《第一線》上發表〈郭沫若先生的訪問記〉及詩〈窗前〉。依其文稿推測，他可能是旅日學習理科但對中國當代文藝有所關心的青年。

[66] 參見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訪問郭沫若先生〉，《臺灣文藝》2卷2號，1935年2月，頁98-100、106-112。可惜《郭沫若年譜》及《郭沫若書信集》中無相關記載，因此無法深入得知郭氏觀感。

[67] 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臺灣文藝》2卷2號，1935年2月，頁99。《郭沫若年譜》對此事也有記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之便與中國旅京作家先取得交流。以文聯東京支部的活動來看，東京支部確實在這個方向上努力甚多。

從賴明弘發表於誌面上的郭沫若覆信或訪問記來看，郭氏除了鼓勵臺灣作家廣泛聯絡新舊文學者、更「積極大膽」地展開文學活動之外，對文聯人士的指示甚少。不過「積極大膽」一語，已概略可見郭氏的期許。與左聯東京支盟刊物相比，當時處於島內高壓狀　況下的《臺灣文藝》確實顯得保守消沈。儘管誌面記載有限，但是依文聯人士或東京支部成員與中、日左翼文學者的交流推測，郭氏私下的指示或影響可能不止如此。前述吳坤煌、張文環與支盟成員的交流足可證明中臺青年交流之深，此外在許多交流場合臺灣青年也不難接觸到郭沫若。郭沫若與日本左派學者增田涉在《臺灣文藝》上的一段小對話，便是一個例子。1935年元旦郭沫若致文《臺灣文藝》，對增田涉於改造社出版的《魯迅傳》中有關創造社扣留羅曼羅蘭致魯迅信一事提出澄清。《臺灣文藝》於2月號刊出郭氏〈魯迅傳中的誤謬〉[68]一文後，隨即贈予增田涉。增田氏讀完後也立即在3月號發表〈關於「魯迅傳」之辯解〉（〈「魯迅傳」について言分〉）[69]一文，向郭氏致歉、說明，文末他還祝福《臺灣文藝》日益發展。郭將一則與臺灣文壇無涉的批評文寄往《臺灣文藝》而非其他中國刊物，從而促成了《臺灣文藝》與日本中國研究界重要學者增田氏的接觸，並引起了一段難得的中日左翼文學人士的對話。這或許也是郭沫若對《臺灣文藝》的特別用心吧？

（三）跨域交流活動與《臺灣文藝》的活化

赴京進行合流工作的賴明弘於1935年3月左右返臺[70]，隨著這位靈魂人物的歸來，《臺灣文藝》誌面更明顯地反應了他們所受的刺激，或許賴明弘私下帶回了什麼更令人振奮的消息吧？他返臺次月，《臺灣文藝》4月號隨即刊出了「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話會」記錄，以及左聯東京支盟成員雷石榆的詩〈顫動的大地〉（〈顫へる大地〉）。這是舊《福爾摩沙》同人首次以「文聯東京支部」新團體名義現身於《臺灣文藝》，也是「左聯東京支盟」份子首次

[68] 郭沫若〈魯迅傳中的誤謬〉（中文），《臺灣文藝》2卷2號，1935年2月，頁87-88。

[69] 增田涉〈「魯迅傳」について言分〉，《臺灣文藝》2卷3號，1935年3月，頁42-44。

[70] 此係根據《新高新報》467號〈編輯餘墨〉所載記事：「元本報漢文部編輯賴明弘君，自去年九月初旬，抱遠志而負笈東都，在京研究文藝，稗益斯途不尠，此回歸來，仍在本報編輯部活躍。」參見，《新高新報》467號，1935年3月30日，頁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公開參與《臺灣文藝》，因此格外有意義。

5月號刊載的一些文稿，也處處流露受激勵之情。賴明弘翻譯了森次勳於日本《文藝》上發表的〈中國文壇的近況〉一文。在譯文之前賴氏特別說明：「中國文學是臺灣文學的母體，也是有著不解之緣。攝取消化中國文學之精粹，是我們的共同欲求。可惜！近年來我們離開中國文學太遙太遠了，因為種種的情勢」。[71]另外，賴明弘還發表了〈我們目前的任務〉，反覆強調文藝運動深入大眾、愛民眾、反映民眾心聲的重要性，並標舉文聯成員「親近讀者，和大眾握手」、「超越個性，提攜前進」、「支持文聯，擁護臺文」的三大任務。不過，賴明弘曾興奮地強調「與中日競賽」、「與世界文學比肩」的目標。他說：

> 「臺灣文藝」獲得了劃期的底成績，作了未曾有的記錄，在這精神文化最為落伍的我們臺灣。然而還不是耀武揚威的時候呢，現在的程度還是太低下。能夠和中國文學比拳，和日本文學競賽，和世界文學並肩，路途遙遠，當待死狂般地奮鬥而奮鬥，努力又努力，拚命再拚命之後。[72]

由此可見，賴明弘在呼籲島內文藝者接受文聯領導、注重群眾、精誠團結的前列「三大任務」之外，似乎還熱衷另一不便過度強調的任務，那就是——與中日作家合作。

同號刊載的張深切〈「臺灣文藝」的使命〉一文，顯示深入群眾、與中日作家交流、積極大膽展開文藝活動等，此時已是文聯核心人士之共同希望。張如此說道：

> 「臺灣文藝」自出版以來，得諸同志們的鼎力，逐號內容充實，嘉義支部的奮鬥，東京支部的努力，臺灣支部的組織活動等等，咱們的工作時時刻刻在著擴大化，最近上海又決定組織支部，以王白淵、張慶璋、張芳洲諸同志為中心，在進行活活潑潑地活躍，臺南方面也開始著手組織支部，廈門方面已有幾位同志來函要求本部准

[71] 森次勳（著）、賴明弘（譯）〈中國文壇的近況〉，《臺灣文藝》2卷5號，1935年5月5日，頁22-24。

[72] 賴明弘〈我們目前的任務〉，《臺灣文藝》2卷5號，1935年5月5日，頁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設置支部，咱們的工作漸由文墨運動而進展於行動運動了。[73]

臺灣↔東京↔上海！擔任文聯常委及《臺灣文藝》編輯重任的張深切，也充滿企圖地勾勒著臺灣文藝運動的新藍圖。在這位曾受左翼思想洗禮的文學旗手心中，藉由跨域活動使臺灣文學運動從「文墨運動」進展爲「行動運動」是他的理想，也是《臺灣文藝》的使命。

2 卷7期（7月號）以後賴明弘加入編輯陣營，該號刊出了陪同他拜訪郭老的蔡嵩林〈中國文學的近況〉一稿，內容也在介紹中國現代文壇的動態。編輯張深切在編後記中也說：「咱們機關誌受了重大的刺激，開始奮鬥的躍進了。由保守的而跑進擴大化，由消極的而進出積極化，由敷衍的而演進戰鬥化了。」[74]誌面上文稿顯示，隨著跨域交流的展開《臺灣文藝》深受激勵，從而躍躍欲試了。

除了將《臺灣文藝》介紹給雷石榆、魏晉等中國旅日作家，並邀請他們投稿之外。東京支部成員可能也積極地把《臺灣文藝》介紹給其他日本左翼文士，因此誌面上也出現一些來自東京文士的稿件。譬如：久野豐彥〈東京文學を輕蔑し給へ〉、沖田順之〈邦畫の貧困〉、植村諦的詩作〈高圓寺驛前通り〉等。[75]植村諦曾與吳坤煌一起出席過《一九三四年詩集》出版記念會及《沙漠之歌》刊行記念會，他的詩稿在《臺灣文藝》登載時與吳詩並列，因此極可能是吳坤煌居中介紹的。久野豐彥（1896-1971，小說家、評論家）[76]〈予東京文學蔑視吧〉（1936年4月）一文，尤有意思。久野在文中大肆批判淪於商業主義、頹廢虛無的東京文壇，呼籲臺灣作家莫以東京文學是尚，盲目追隨。他認爲臺灣作家應勇敢描寫新的社會形勢，像賽珍珠一樣取材於中國土地與農民的厚實作品才是值得效法的。

1936年之際東京文士中出現了呼籲臺灣作家捨棄東都文壇，追求臺灣文學主體性的呼聲，這是相當難得的。然而這種思維的誕生，不能不歸功於臺灣旅日青年長期的鍛鍊、摸索與努力。在渴望前進東京，浪跡帝都不歸的臺灣文藝青年心中，向日本文學者模倣、效顰從來都不是他們唯一的目的。在新感覺主

[73] 張深切〈「臺灣文藝」的使命〉，前揭文，1935年5月5日，頁19。

[74] 張深切〈編輯後記〉，《臺灣文藝》2卷7號，1935年7月1日。

[75] 植村諦一文刊載於3卷6號，另兩稿刊於3卷4、5合併號。

[76] 久野豐彥，曾參與《葡萄園》、《近代生活》等雜誌，著有短篇小說集《第二個列寧》、評論集《新藝術與達達主義》等。1932年長篇小說《人生特急》出版遭禁後，興趣轉移到經濟學。參見，呂元明主編《日本文學詞典》前揭書，頁4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左翼文學或其他流派華麗並陳的東都文壇中，不論臺灣青年作家取哪一瓢飲，多數人的眼光仍是凝視著南國鄉土的。那令人愛之且痛之的老鄉土，還有拜現代論述或社會主義理論之賜，浮現於弱小者眼前令人羨慕之想望之的新夢土，始終左右著旅日青年的情感與視線。臺、中、日左翼文人聯合建構的超殖民、超種族新國度，便是這些失去祖國或失去容身社會的弱者心中勾劃的夢土之一。對臺灣作家而言，東都文壇充其量不過提供較自由的想像空間、較多的資訊與資源，以及較優越專業條件而已。

臺中日左翼文學者、文化人的跨域交流，也是1935年11月創刊的《臺灣新文學》的重點經營之一。左翼旗手楊逵在《臺灣文藝》跨域交流的基礎上，與日本左翼文士進行的互動絲毫不遜色，不過在爭取中國旅日作家方面不免落後文聯許多。在跨域交流方面，文聯東京支部與推動各式活動的左聯東京支盟相較未免稚嫩。但是比起高達萬餘人的旅京中國學生和僑民以及不下500名的進步份子，文聯東京支部以寥寥十數人卻能共襄交流盛舉，實在相當不容易。

誠如吳坤煌所言，文聯東京支部締造的跨域交流，在臺灣文學史上確實是絕無僅有的。

五、小結

《福爾摩沙》苦撐三期之後，決定與臺灣文藝聯盟合流。支部設立後異鄉文學者與島內文壇有了較密切的聯繫，文聯對支部的期許也爲這批旅日文學者帶來了新刺激。以文聯東京支部爲中心，脫退者吳坤煌重新歸隊，在張文環等人協助下合力推動許多活動。支部藉著地利之便與中國、朝鮮、滿州國旅日的文學者都有往來，與日本的左翼文學團體也有交流。

吳坤煌、張文環等支部作家有意以文學承繼反殖運動，寄生在東京各個反帝團體中。雖然活動有限，但是在日、中左翼團體中確實可以察覺他們的蹤跡。對這些旅日青年來說臺灣是他們終極的關懷，在反帝運動中他們是獨立的中心主體，在統一戰線中與其他民族平等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依附於以中、日民族爲運動中心的國際陣線，他們也難免成爲戰線中的邊緣客體。這種既中心又邊緣的文學運動與文化抗爭型態，以及當時臺灣作家與中、日，甚至朝鮮、滿洲國等文學者的往來，在臺灣文學史上堪稱特殊的一頁。

日本左翼文化界早有相當規模的跨域活動，以日本左翼劇壇、文壇爲中心的跨域活動，參與者包含了中、臺、朝鮮，甚至國際左翼團體在內的各國旅日人士，臺灣文藝青年與中國旅日戲劇、文學人士的交流接觸正建立於這個基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廣泛聯合被壓迫民族，建立社會主義民族文化或社會主義國際文化，是社會主義革命策略，也是社會主義文化運動的理想。以臺灣島內之禁錮與旅日青年之薄力，借重日本左翼陣營廣結中國及其他民族革命勢力，似乎是建立國際聯合陣線、追求臺灣解放的便捷辦法。吳坤煌在築地劇場接觸日中鮮各地左翼人士後逐漸往此方向發展，曾因此疏離他認爲不夠大眾化、激進的《福爾摩沙》集團。直到文聯東京支部成立後，文藝大團結的走向再次燃起了他對故鄉文學團體的熱情，才又回頭引領難兄難弟們追求那片夢土。

固然，《福爾摩沙》作家絕非全數皆爲左翼作家，但是他們的民族處境、思維方式、對抗策略很自然地使他們具有左翼性質卻毋庸置疑。或許旅日青年的文學志向，在標榜「民族藝術研究機關」或「純文藝」路線的《福爾摩沙》階段，尚不十分明顯。但是到文聯東京支部時，他們與各方左翼勢力進行串聯，欲藉此與權力中心對抗的野心已歷歷可見。1937年事變前後返臺的他們被迫進入另一個更爲壓制的空間與年代；戰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臺灣社會也不容許他們詳敘這一段往事。不過文化菁英意圖螳臂當車的那種悲壯志向確曾存在，而左翼思維那一涓細流也斷斷續續潛行於臺灣知識人的精神結構之中。

（責任校對：吳品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專書

上海魯迅記念館編，《左聯記念集1930-1990》，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左聯回憶錄》（上、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臺北：南天書局，覆刻本，1995。

巫永福，《巫永福全集》。臺北：傳神福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姚辛，《左聯詞典》，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4。

胡風（著）、鷲巢益美（等譯），《胡風回想錄》，東京：論創社，1997。

劉柏青，《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簡史（1921-1934）》，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85。

劉捷，《我的懺悔錄》，臺北：農牧旬刊，1994。

劉捷，《臺灣文化的展望》，高雄：春暉出版社，1994。

新竹市政府，《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

謝榮滾，《陳君葆日記（下）》，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

襲濟民，《郭沫若年譜》，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二、報刊雜誌

吳坤煌，〈現在的臺灣詩壇（上）〉，《詩歌》（詩歌社）1卷2號，1935。

吳坤煌，〈現在的臺灣詩壇（上）〉，《詩歌》（詩歌社）1卷4期，1935。

吳坤煌，〈希望大家能打破這目前文藝界的沈寂〉，《新生報》，1946。

吳坤煌，〈懷念文環兄〉，《臺灣文藝》81期，1983。

郭沫若，〈魯迅傳中的誤謬〉，《臺灣文藝》2卷2號，1935。

森次勳（著）、賴明弘（譯），〈中國文壇的近況〉，《臺灣文藝》2卷5號，1935。

張文環，〈教育と娛樂〉，《臺灣日日新報》，1937。

張深切，〈「臺灣文藝」的使命〉，《臺灣文藝》2卷5號，1935。

雷石榆，〈我所切望的詩歌〉，《臺灣文藝》2卷6號，19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雷石榆，〈給某詩人們（祖國的感想之一）〉，《臺灣文藝》2卷6號。

增田涉，〈「魯迅傳」について言分〉，《臺灣文藝》2卷3號，1935。

諸家，〈臺灣文聯東京支部第一回茶話會〉，《臺灣文藝》2卷4號，1935。

賴明弘，〈郭沫若先生的信〉，《臺灣文藝》2卷2號，1935。

賴明弘，〈訪問郭沫若先生〉，《臺灣文藝》2卷2號，1935。

賴明弘，〈我們目前的任務〉，《臺灣文藝》2卷5號，1935。

謝霜天，〈再出發的詩人——訪吳坤煌老先生〉，《中央月刊》14卷7期，1982。

魏晉，〈最近中國文壇上的大眾語〉，《臺灣文藝》2卷7號，1935。

三、論文

（一）一般論文

北岡正子，〈『日文研究』という雜誌（下）：左聯東京支部文藝運動の暗喻〉，《中國——社會と文化》第5號，東大中國學會，1990。

北岡正子，〈雷石榆『沙漠の歌』：中國詩人日本語詩集〉，《日本中國學會報》第49集，日本中國學會，1997。

柳書琴、邱貴芬主編，〈爲了臺灣普羅大眾文學的確立——楊逵的一個嘗試〉，《後殖民的東亞在地化思考：臺灣文學場域》，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二）學位論文

張雅惠，〈賴明弘及其作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四、會議論文

垂水千惠，〈臺灣新文學中的日本普羅文學理論受容：從藝術大眾化到社會主義〉，《「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究會」論文集》，南港：中研院文哲所，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Marginal Struggle in Taiwan Literature：Taiwan Writers Studying in Tokyo in the Cross Domain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Liu, Shu-Chin *

Abstract

There was a relatively large cross domain exchange in Japanese leftist cultural circles in the 30's. This cross domain exchange was centered on Japan's leftist theatre and leftist literary circles and participants included Japan, China, Taiwan, Korea, Manchukuo and even various foreign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leftist groups staying in Japan. The exchange between Taiwanese cultural circles and Japanese leftist cultural circles and Chinese members of the theatrical and literary world traveling to Japan was based precisely on this foundation. Effecting these exchanges in Taiwan were a group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youth wishing to make use of the Japanese leftists' cultural camp and link up with international anti-imperial forces and striving for liberation from colonialism.

The youth gathering around the Taiwan Art Research Society sank into a state of inertia in 1934 due to problems with expenses, manpower and the ideologies of its members. However, with the founding of the Taiwan Art Union and the coming together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on the island, it quickly sprang forth as a vanguard linking up with overseas literary and artistic movements for the Taiwan Art Union centered on Wu Kun-Huang, Chang Wen-Huan and others. Taiwan Art and Literary Research Society underwent a transmutation in 1935 to become the Art Union Tokyo Branch and by the autumn of 1936, they had carried out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with several Chinese and Japanese anti-imper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in Tokyo. Although their activities were limited, the vision and pursuits they revealed in the course of their exchanges was something to be treasured. For this group of youth resident in Japan, Taiwan was something they cared infinitely about and they acted as an independent body in the international anti-imperialist movement, cooperating with other nations on a basis of equality. However, due to their primarily Chinese and Japanese international front, it was hard to avoid becoming a marginal entity. The form of cultural struggle of this both centralized and marginal literary movement and the contacts between Taiwan authors and Chinese, Japanese and even Korean, Manchukuo and other literary personages, can be said to be a special chapter in Taiwan's literary history.

This splendid chapter in Taiwan's literary history has never been given

* Assistant Professor,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The purpose of this text is to make a preliminary outline of some of the rare and valuable cross domain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the soul characters of the Art Union Tokyo Branch; Wu Kun-Huang and Chang Wen-Huan.

Keywords：Art Union Tokyo Branch, Leftists Federation Tokyo Branch, “Taiwan Art”, “Formosa”, Wu Kun-Huang, Chang Wen-Huan, Wang Pai-Yuan, Lai Ming-Hung, Lei Shih-Yu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